

19 世纪法国文学里的中国

孙 敏^①

[摘要] 本文通过梳理 19 世纪法国关于中国的重要文学文本,发现这一时期的中国想象呈现出一种天堂与地狱的两极化倾向:诗意的艺术国度与末日的帝国形象并存,由此出发探讨了这一想象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成因。

[关键词] 19 世纪;法国文学;中国想象

Image of China in French Literature of the 19th Century

Sun Min

[Abstract] By combing the important texts about China in French literature of the 19th century,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imagination of China in this period is polarized into heaven and hell; the poetic China coexists with the fallen China, and thus explores the soci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auses that the imagination has arisen.

[Key Words] 19th century; French literature; Imagination of China

门多萨的《大中国帝国志》第一次以历史文本的形式对中国进行了一次全面而完整的讲述,在欧洲产生重大影响。人们对中国的认识逐步从物产富足、幅员广阔、城市星罗棋布等外在的繁华景象深入到中国的政治体制、道德伦理、圣哲文化等理性层面。1687 年,法王路易十四派遣 5 名耶稣会士到中国开展传教事业。这一举措影响深远,耶稣会士的著述成功地将中国从遥不可及的梦中乐园变为鲜明的、触手可及的现实世界,为整个 18 世纪的“中国热”奠定了知识基础。

启蒙时代的“中国热”不仅包括对中国特有的事物,诸如瓷器、丝织品、茶叶、漆器、园林艺术等的热情,更是对中国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等所谓“中国风格”的追慕与模仿。而启蒙思想家和在“礼仪之争”中各执一词的传教士则成功地创造了一个“文化中国”,掀起对中国的制度、哲学、道德、习俗、文字、历史等前所未有的研究。

至 19 世纪初,“中国热”退潮,中国成为过时的文学主题,随着东方主义(Orientalise)潮流的兴起,不少作家将目光转向中东,将之视为新鲜的文学题材,以此来渲染一种新的异域

① 作者简介:孙敏,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国际教育和中外文化交流。

情调。中国只在少数作家笔下出现,或者作为一种历史、文化资源,如夏多布里昂在《基督教的真谛》(*Génie du Christianisme*)中提及在中国的法国传教士;斯塔尔夫人在《柯丽娜》(*Corinne*)中,以长城为喻,批评法国戏剧界的僵化、不思革新。或者作为“中国热”中遗留的风尚出现,如福楼拜的《情感教育》中出现了中国的灯笼、瓷器、古董、百叶窗、黄色的丝绸等,雨果在描述圆明园梦幻般的奇景时,也沿用了玉石、青铜、瓷器、丝绸、彩釉珐琅等流行于 18 世纪的中国工艺品。

真正开始发掘中国的艺术价值,对中国进行诗化想象的当属泰奥菲尔·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早在 1830 年,戈蒂耶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一点他在《法国青年》(*Les Jeunes France*)中有所提及:“如果你们想知道,……为什么我渴望获得金钱,我要告诉你们……为了购买日本的古董壶和中国的瓷人。”^[1]1835 年他更是写下了《中国热》(*Les Chinoiserie*):

如今,我的爱在中国。/她与年迈的父母住在细瓷塔中,/在那鱼鹰出没的黄河畔。/她的双眼向鬓角处挑起,/她的小脚可握在手中把玩,/她的黄皮肤比铜灯还亮,……每个黄昏,她如同诗人一般,将垂柳和桃花咏叹。^[2]

在这首诗里出现了 18 世纪“中国热”盛行时典型的 中国 意象,如小脚女人、桃花、柳树、铜灯、黄河等,诗人借由这些意象组合起一种唯美的氛围,将中国塑造成世俗之外的“桃花源”。诗中的“瓷塔”与象牙塔类似,生活在其中的中国姑娘过着吟咏自然、远离尘世喧嚣的诗意生活。这与诗人“为艺术而艺术”的理念不谋而合。与此同时,“中国”还成为一种生活情调的传达:精致、奇幻、纤巧、轻盈。它体现的是与西方传统审美观迥然不同的审美风格。

此后,戈蒂耶还创作过一系列与中国有关的作品,如作于 1865 年的《咏雏菊》(*A Marguerite*)里再次出现了雏菊、桃花、绿柳、儒官、诗人等传统中国意象,并由此营造出一种美轮美奂、远离日常生活形态的中国形象。《水榭》(*Le Pavillon sur l'eau*)则讲述了年轻的诗人与少女相互爱慕,以诗传情的故事,以此传达一种全新的爱情模式与生活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戈蒂耶对中国的偏爱影响了身边的一批作家,如福楼拜、龚古尔兄弟、路易·布耶、波德莱尔等都曾是其家中的常客。1861 年戈蒂耶为其女朱迪特(*Judith Gautier*)延请中国人丁敦龄为家庭教师,这在当时的巴黎文人圈引起轰动。丁敦龄作为典型的异域符号,成功地激发起一批法国作家对中国的兴趣,在龚古尔兄弟的日记中就专门记录了与丁一起共进晚餐的情形。更重要的是,朱迪特在丁敦龄的帮助下,用法文翻译了中国古典诗词并于 1867 年结集出版,取名为《玉书》(*Le Livre de Jade*)。诗集按题材分为 8 类,分别是“爱情”“月”“秋”“酒”“诗人”“战争”“宫廷”“行旅”,出版时,每一类前还附有中文题词,如“爱情”题“黄金柳叶浮水”,“月”题“玩月谈情诗词”。就翻译本身而言,《玉书》是不忠实的。朱迪特以一种更自由的、散文化的形式对中国古典诗词进行了富有个人特色的改写,但保留了大量中国诗词独有的意象,并营造出一种浓郁的浪漫气息,吸引了不少法国作家。

这一唯美、诗意的中国形象在她其后的作品中不断重复,如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皇龙》(*Dragon Impérial*)、戏剧《天女》(*La Fille du Ciel*)等都在历史的框架下,编织出一个又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中国式场景。但作家所迷恋的中国不具备多少真实性,她看重的是历史尘封下符合她审美想象的异国世界。她一直称自己为中国人,却一生未曾到过中国,也一直抗拒到现实的中国旅行。她不对中国作现实的追问,而是将其供奉于古典的、永恒的美之神

坛上,其本质就是以诗化的中国来对抗庸常的社会现实。

在她的影响下,帕尔纳斯派诗人(Parnasse)及其后诗人笔下的中国都呈现出类似的特色。如马拉美的诗作直接将中国与法国作比,以对中国式生活的想象传达他的自我精神:

我要放弃一个残忍的国度/贪婪的艺术,笑对友人,/过去,天才,还有目睹/我痛苦挣扎的油灯陈旧的责难,/模仿心灵澄澈细腻的中国/他醉心于在狂喜的月下/在雪白的茶杯上,静心描绘那朵/奇花的终岁,香泽他一生/透明的,她的芳馨,孩提时,/渗入他灵魂的青色花纹。/怀着智者唯一的梦死去,/泰然,我将选择一片年轻的风景/我还会漫不经心,在茶杯上绘制。/一条纤细苍白的蓝色线条将是/一片湖泊,在光洁的瓷天间,/白云遗落的一弯清亮的蛾眉/将她沉静的尖角浸入湖水的镜面,/不远处,三根修长的翡翠睫毛——芦苇。^[3]

“残忍国度”即当时充满了喧嚣和精神动乱的法国。狂喜的月下、雪白的茶杯、青色花纹、湖泊、瓷天、蛾眉、芦苇等一系列意象建构起另一个远离尘嚣、纯粹的诗学世界,静谧、温馨、明净、和谐,正是诗人追求的理想境界,他如梦者一样沉浸在这个空间里。

从这首诗中,我们不难发现,对中国的想象来自对“现实”的自觉抗拒。这与当时文学界反驳“文学模仿现实”的倾向相合。尤其是象征主义兴起后,他们强调想象的重要性,甚至将作家的想象力提升为认识真理世界的能力,借以反抗自然主义的创作理念。象征主义以“想象”对抗“现实的摹写”,以想象力的真理性对抗所谓的“客观真实”。马拉美曾以“说一朵花”为例,说明他的诗学追求。他所写的不是众所周知的花,而是“在所有的花都不在的情况下”绽放的众花之花,是奇妙的思想之花,抽象之花。换言之,文学要表现的不是具体的物象,而是理想的物象、物象的本质。这就如同要表现一朵理想的花,就不能只描绘某一种花的形象,而是各种花的形象的升华。因此,文学作品是诗人想象的产物,是纯粹的创造。与现实世界相比,它更有价值。中国之于诗人的价值正在于此。

法国诗人以“虚构”的力量在作品中渲染出一个美妙奇幻的中国,这里才子佳人遍地,人人把酒吟诗,过着诗一般的生活。中国在诗人们笔下就是世俗的“对立物”,是一个离现实要多遥远就多遥远的地方。

当然,这种对中国的诗化想象,除了自身的诗学追求之外,也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一方面,它继承了18世纪“中国热”形成的中国总体想象,其中反复出现的中国式风物、儒官诗酒唱和的生活等为诗人的想象提供了起点。另一方面,它与19世纪汉学领域对中国文学的译介不无关联。这一时期的文学关注点主要是古典诗词和俗文学,如儒莲先后翻译出《赵氏孤儿》《灰阑记》《西厢记》,也翻译过一些白话通俗小说,如《平山冷燕》《玉娇梨》。1862年,埃尔维·圣-德尼侯爵(Marquis d'Hervey Saint-Denys)首次出版《唐诗》选译本,收录唐代35位诗人的97首诗歌。这些文学作品所呈现出的中国正好是古典的、诗意的。即便是通俗的戏曲、小说,也不乏才子佳人、吟诗作对的场景,这就进一步营造出中国遍地是诗的幻象,从另一个侧面强化了诗人们的想象。

值得注意的是,对中国情调的描述在不断的重复中不可避免地往否定的一面延展。让-雅克·安培在介绍中国的一部诗体小说时说:“它既优雅又奇特,不连贯而又细致,……沉溺于苍白、黯淡、精致的,永远重复的意象中。这是一个发育不全的民族在暮年享受的颓废的快乐。”^[4]这种评述日益成为大众文学中表现中国的主要意象,与潜在的另一种否定中国的

冲动合谋。

我们不能忽视 1840 年以来,法国的殖民扩张政策和民族优越感逐渐增强带来的影响。早在 1838 年约瑟夫·梅里就预言了东方的西化,东方在其叙事框架中成为西方的对立面。梅里的小说《英国人与中国人》(*Anglais et Chinois*)以欧洲水手与中国贫民在广州街头的冲突为开端。中国人在小说中变成暴力与仇恨的化身,欧洲人往往不得不对恶意的挑衅,自我防卫。更重要的是,以往对中国的追慕与向往,在小说中变成了中国的贵妇人对英国军官的迷恋,隐含其中的白人优越感和膨胀的自信心不言而喻。

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对中国的嘲弄与蔑视逐渐占据上风。如多米埃(Honoré Daumier)自 20 世纪 40 年代起就在《喧嚣》日报上连续刊载以中国旅行见闻为题的组画,里面充斥大量对中国的嘲讽;为迎合国家政治立场与大众期待,不少作家将中国塑造成即将被征服的野兽,要接受西方改造的野蛮民族。1860 年,梅里美在《致无名者的信》(*Letters à une inconnue*)中称:我已经准备好要征服中国。同年,唐纳里(Dennery)的军事戏剧《攻克北京》(*La Prise de Pékin*)在巴黎剧院上演。1864 年,法国军官吉戈尔(Giquel)的《中国内战日志》(*Le Journal de Guerre Civile de Chine*)将殖民征服与异域情调结合在一起,既有战场上征服者一边打台球、一边观战的强大优越感,也有在战争中风雨飘摇的中国与中国人悲惨的生存状态,还有士兵们围着摇曳的篝火,畅饮冰凉的苦艾酒,直喝到酩酊大醉的异域狂欢。日志以一种隐而不显的笔调呈现出所谓“真实”的、衰败的中国,为殖民征服张目。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对中国的梦幻想象遭遇更严峻的挑战。这一时期,法国在中国的殖民势力日益扩大,中国的国门也逐渐向法国敞开。很多作家得以到中国游历,在他们的视野里,中国自然而然地被分裂为两个世界:一是古老的、诗意的中国,它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是难以被参透的神秘文明;二是现实的、落后的中国,贫穷、苦难、暴力、愚昧等种种现代文明的否定形态交织在一起,中国俨然就是难以忍受的人间地狱。不少精英知识分子对中国的表现往往彷徨于欣赏、沉醉与恐惧、排斥几种情感状态之间。

世纪末最有名的异域作家洛蒂(Pierre Loti),曾作为“八国联军”的法国军官,两次出征北京,镇压义和团运动,还曾领军进入紫禁城,在这座昔日神秘、宏伟的宫殿里游玩。他在《私人日记》(*Journal Intime*)与《北京的陷落》(*Les derniers jours de pékin*)里记载了他的中国之行与在中国的体验。不可避免地,他对中国的描述带有某种征服者的满足感和居高临下的姿态。作为征服者,他看到的是充斥着灾难、战争、仇恨的中国,到处是废墟、尸体、荒芜的山村和目光呆滞的贫民。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在中国寻找诗意,在破败的大地上缅怀逝去的美。他笔下的中国弥漫着一种抹不去的哀怨与忧伤,从而冲淡了中法民族仇恨与殖民主义情绪。另一方面,他把所谓的“中国情调”发挥到极致,乐此不疲地描述中国奇异的古董、珍玩、服饰,迷恋于搜寻中国与众不同的风物。《私人日记》中就记载了他如何巧妙地将慈禧的鞋子藏好,偷运回法国的场景。

另一位曾到过中国的克洛岱尔也拥有双重身份:法国驻华领事与作家。作为领事,他看到的中国与洛蒂别无二致。与洛蒂不同的是,作为现代文明的批判者与逃避者,他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他在《认识东方》(*La Connaissance de l'Est*)中借由园林、宝塔、寺庙、陵墓、戏剧与诗歌建构起的中国,是一个宁静、安详的怀旧天堂,是与西方现代病相抗衡的古典世界。

如果说,19 世纪末期法国的精英知识分子尚能在中国如暗夜的现实中镀上一层浪漫与

理想化的色彩,那么在大众与通俗文学的想象中,中国则被塑造成一个“地狱”。在他们笔下,中国人粗鲁、狡诈、虚伪、无知,终日沉溺于吃喝玩乐。早在 1872 年于连·凡尔纳(Jules Verne)的著名小说《八十天环游地球》(*Le Tour du Monde en quatre-vingts jours*)里,中国人便以瘾君子的反面形象出现。1879 年,凡尔纳更是以《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苦难》(*Les Tribulations d'un Chinois en Chine*)为题,讲述了一个欧化的中国人王金福(Wang Kin-Fo)在中国的种种磨难。王金福在外貌上接近白人,而且接纳现代文明与先进技术,但是他骨子里仍保有中国人的特质。所以,他在中国处处碰壁,最后差点因丧失全部财产而自尽。小说处处展示出对中国人灵魂的轻视和改造中国人的意愿。

保罗·蒂瓦尔(Paul d'Ivoi)在《中国蝉》(*Cigale en Chine*)中更是称“中国文明是一种虚假的文明……它的一切精致之处都最终走向极度的自私自利和毫无节制的残酷”^[4]。所以,小说的女主角“芦花”公主最终因皈依基督教,获得了法国军官的爱情。

我们可以看到,19 世纪法国文学想象里的中国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中国:一是诗意的艺术国度,它延续了旧时中国热时所塑造的那个理想的、神秘的东方帝国形象,同时应和了唯美主义诗人、象征派诗人的创作理念,作为艺术化的想象世界,这个中国与现实无涉,是诗人们所构想的、与现实世界形成对抗的审美世界;一是末日的帝国,它迎合了国家政治立场与大众想象,在将中国降格、丑化的过程中,以文明/落后的二元叙事为法国的殖民征服提供合法的依据。

参考文献

- [1] Théophile Gautier. *Le Bol de Punch*. 1833.
- [2] Théophile Gautier. *Poésies diverse*. Larousse, 1929.
- [3] 涂卫群. 文汇读书周报,2003-7-7.
- [4] 米丽耶·德特利. 十九世纪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M]//孟华. 比较文学形象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46, 255.